《清華學生日記》——凡人六四

西楚盲流

2004 年 6 月 4 日

提要：

凡 人 六 四

•西楚盲流•

前言 △

年年六四，今又六四。網上流傳的一些日記和回憶錄大多出自六四中的學生領袖和重要人物。他們的文章對我們瞭解整個運動的脈絡很有幫助，但無法反映那場運 動中成千上萬的普通人的經歷。近來本壇有人倡議當年的參加者寫一點當時的經歷，筆者謹公開當時的日記，願與各位大俠，特別是六四戰友共用。

這些日記於八九年六四前後斷斷續續寫就，九九年六四十周年時整理成電腦文本。現在公開，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澄清當時普通學生和市民與學生領袖及“幕後黑手”之間的關係。

每到六四，總有一些人跳出來，對當時的學生領袖及其後來的表現攻擊一番，藉以證明政府鎮壓有理。但實際上整個運動完全是自發的行為和自願的參與，人人心 中都憋著一口氣，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會應者雲集。即使王丹不領頭，也會有張丹，李丹出來。正所謂“時勢造英雄”。而且在中國，這種出頭的事總是要冒風險 的，筆者就沒有這個膽量。所以不管他們後來的表現如何，筆者還是很佩服他們的勇氣的。何況他們後來的表現也無可厚非，至少他們沒有受那個反動政府的招安， 去為那個黨效力。

還有一種歪理，認為那些“幕後黑手”把學生煽動起來後就撒手不管，造成政府鎮壓，所以他們應對學生死亡負責。這種觀點簡直是對廣大學生和市民的智力的侮 辱。因為參加運動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十八歲以上的公民，有自己的是非善惡分辨能力。他們為什麼聽從“幕後黑手”的煽動而不聽從政府的煽動呢？政府掌握著絕對 的輿論宣傳優勢，可是人們為什麼寧願相信小道消息而不相信宣傳呢？事實上，每次都是政府的對抗性的宣傳和行為激起學生和群眾採取更激進的行動。

日記中內容若屬親見，作者保證其真實性，若屬聽聞，讀者可參考其他資訊判斷其真實性。因為作者既非“民運分子”（學生領袖），又非“暴徒”，更非熟悉內 情的政府高官，按當局的說法，只能被稱為“不明真相的群眾”，所以對其中聽來的資訊至今仍不能考證其真實性。（轉載時請保持完整性。）

四月十五日 △

今天早晨七點五十多分，胡耀邦逝世。早上新聞沒播。下午正在看電視，突然有人說胡耀邦死了。起初還不相信，後來吃飯時食堂門口已貼出“耀邦同志永垂不 朽”的標語，又有人說北大早已貼了好多，這才有點相信。回來後同學們都在議論這件事，說當今中國唯一稱得上廉潔的領導人只有胡耀邦了。Ｗ同學來找Ｓ說應有 所表示。正好在我的上鋪有一疊綠紙，Ｈ拿下來，到５５５房間寫了兩副標語：“敬愛的耀邦總書記英靈永存”、“偉大的領導、忠誠的戰士耀邦同志千古”。寫好 之後等確切的消息。

６：３０，中央電臺“新聞聯播”果然把胡的死放在第一條播出，但只有一句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耀邦同志因病逝世……”，隨後就轉播其他新聞了。我 們都很不服氣，因為給他的結論太簡單了。Ｗ（黨員）說：“只說了一個政治局委員，什麼評價也沒有，太不象話了！”我們馬上關掉了收音機。可是過了一會兒， 突然又聽到Ｌ他們的收音機在播胡耀邦的生平。我回去打開一聽，果然中央台又將別的新聞中斷，插播了中共中央的訃告。我們立即將標語拿出去，

我、Ｓ、Ｚ和Ｘ 四人在中央食堂門口，將廣告欄上的舞會海報全部撕去，貼上我們的標語。這時旁邊又貼了幾張悼念胡耀邦的標語。

晚上回來，七點鐘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播訃告，班上好多人都在嚴肅地聽著，這在學生中看電視是少有的現象。可見人民的心裏是清楚的，哪人有功，哪人有過， 歷史還是會作出公正評價的。另外一點就是胡耀邦對青年、對知識份子確實是有功可樹、有德可昭的，所以知識份子和青年人對他更有感情。

四月二十二日學生請願親歷記 

學生請願親歷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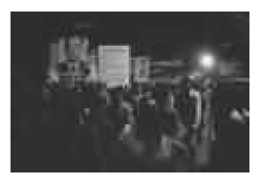


這幾天，學生借悼念胡耀邦之機，又一次掀起了民主高潮。從胡去世後的第二天，即四月十六日起，各高校內大字報鋪天蓋地，情緒日益高漲。從十七日起，陸陸 續續有學生到天安門廣場集會、悼念，並在人民大會堂門口靜坐示威。到十九號，學生人數猛增。北大學生向中央提出七條請願要求，由於無人理睬，更由於學生缺 乏組織，便試圖衝擊中南海，這樣便給政府留下了口實。當天晚上，他們對示威學生實行了封鎖；２０日淩晨三點左右，員警強行沖進學生隊伍，將學生分成幾塊， 然後將他們拖上公共汽車，稍有反抗或逃避即遭毒打。特別是在新華門前，一群學生被追到西單，突然又從前面竄出一隊武警，見人便打。此時已是淩晨四點多，街 上已有過路市民。員警不分清紅皂白，使他們也受到誤傷；尤其是女性，因跑得慢，往往被揪住毒打。據目擊的同學講，有些學生在

地上翻滾還不斷遭到腳踢。有的 頭被磕在車窗上，玻璃被磕碎，血流滿面，哀號四起。



就這樣，“４．２０”慘案，或稱“新華門慘案”２０日便在各高校傳開了。據說被打的主要是北航、師大和工院等校學生，也有北大的，但未聽說有我校的。這 些學生雲集北大，向北大師生揭露事實真相，請求聲援。於是北大當天集合起幾千人之眾，與我校聯繫。不巧從中午開始下雨，大雨滂沱，到晚上還未停息。６：３０北大學生在我校各門碰到的是冷冷的大鐵門。他們在暴雨中站了半個小時，最後失望地離開了。據說當晚還是有北大等校數千名學生冒雨在天安門靜坐，還 有人爬到紀念碑的浮雕頂上演講。



２１日，各高校學生接受了教訓，經多方協商，決定採取聯合行動，在各校內將北大七點建議和行動綱領，並號召大家當晚１０：３０在北師大集合誓師，一起行 動一一去天安門。當晚正好要帶課，所以沒去。但學生告訴我，他們沒課的同學都去了，他們上完課之後也要去。這說明昨晚我校大多數學生都去了。我叮囑他們： 最好白天去晚上離開，因為白天政府不好下毒手。

今天是胡的追悼會，我決定一個人去找他們（我的學生）。九點鐘出發，坐公共汽車到西單，剛一進長安街，通往長安街的各胡同口就被封鎖。我疾速朝天安門走 去。到了新華街（六部口）開始戒嚴，行人一律被成隊的員警推到了街口內。碰巧我和政法大學的一群學生擠到了一起。他們是集合而來，打著“政法大學沉痛致 哀”的橫幅，想沖出封鎖，我也隨著他們往前擠。但畢竟人太少，

多次被員警頂了回來。有一次已經擠進去，但員警人多，很快把我們一個個拉了回來。我就對學生 說，我們人太少，擠過去也白搭。可是有幾個社會青年在我們後面拼命推搡。

十二點左右，載著胡耀邦遺體的靈車疾速駛過長安街。十二點十分，戒嚴解除。被封鎖的人群（主要是學生）都急匆匆趕向天安門廣場，去增援昨天晚上在這裏靜 坐一夜的學生。我先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轉了一圈，只見好多浮雕上都貼上了詩文，有的甚至直接寫在上面。下來後來到人民大會堂前，大會堂的臺階下和兩側坐 著四五排武警和士兵，與靜坐的學生面對面對峙。我費了好大勁才找到我校的靜坐地點，他們專門設立了糾察，胳膊挽胳膊圍成一圈，凡要進去必須出示我校學生 證。我一進去，人群突然站起來，說是李鵬出來了。我還沒看清是怎麼回事，前面又立即坐下，看來李鵬已進去。前面武警和士兵又增加了兩排。



兩點鐘左右，學生派出三名代表進入武警的封鎖圈，去向李鵬呈交學生的七條要求，在大會堂門口受阻。他們三人就跪在離頂端不遠的臺階上，中間一人手執呈文 舉過頭頂。半個多小時過去了，李鵬還是遲遲不露面，反而前面又添了兩隊士兵。我對跪著請願本不以為然，因為這又不是封建社會，我們和政府本來就是平等的，但政府卻表現得這樣沒有器量，連出來敷衍一下都不幹，也太不近人情了，只能激起別人的憎恨。這時人群有些騷動，據說前面有員警沖到學生面前用警棍打了學 生。為了避免發生衝突，組織者決定撤走［注］，遊行回校。於是學生代表被召回，北大上長安街，我校上前門東大街分別遊行。我在遊行隊伍的週邊作糾察，與其 他同學手挽手圍著裏面的隊伍，以防別有用心的人混進來。剛出廣場，路邊的市民給我們送來成箱的麵包、汽水，同學們分著吃、喝。我們喊著口號：“打倒官 倒！”、“打倒官僚！”、“懲辦兇手！”、“取消特權！”、“剷除腐敗！”、“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民萬歲！”、“感謝人民支持！”……唱 著“國際歌”，經復興門、西直門走回學校，沿途不時有群眾免費送來成盒、成箱的冰棍、汽水。

進校門後，受到先坐車回校的同學的熱烈歡迎。我們一直走到中央食堂前，這次遊行的組織者（據說是研會主席）向校內同學通報了今天的情況，並號召大家聯合罷課，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

［注］後來得知，當時站在紀念碑臺階上身穿夾克、拿揚聲話筒講話的是王丹。

五月六日

新“五四”運動 

二十二日遊行之後，新華社、《人民日報》等新聞單位繼續對學生運動進行了歪曲報導，並且在二十六日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把學生運動定性 為動亂，並調王牌三十八軍入京，大有劍拔弩張之勢，一片“紅色恐怖”籠罩著北京。各校領導紛紛向本校學生自治籌備委員會施加壓力，許多人退縮了。特別是我 校籌委會（原為研會成員投機“革命”時所領導）宣佈辭職，在我校引起人心浮動；有的人怕上街遭到鎮壓，有的人已準備複課。這時傳來消息，北京高校自治聯合 會宣佈在二十七日舉行大遊行。我校新的籌委會為學生會篡奪，退出了高校聯合會，並宣佈不參加遊行。這下可激怒了為這次運動付出了辛苦的廣大同學。晚上十一 點半左右，一部分學生從八號樓附近出來，在校園內高呼：“我校！————遊行！”立即得到大多數同學的回應，並彙成一股巨大的人流在學生區內遊動。大家達 成了第二天早晨八點參加遊行的默契，然後回宿舍睡覺。



二十七號的遊行創下了學運史上的紀錄，據估計有十五萬學生參加了遊行，加上圍觀市民，總共有幾十萬人。學生們先後在中關村、西直門、復興門、西單等處衝 破員警封鎖，順利通過了天安門廣場，這就宣佈了政府的高壓政策的破產。更感人的是沿途市民的熱情支持，一旦學生衝開員警的封鎖，市民便將員警圍住，把他們 和學生分開。一些市民還截住了開往天安門的三輛軍車，對他們說：“你們別打學生呀，他們也在幫你們說話。你們有種的去打越南鬼子！”二十八日淩晨一點半， 最後一批步行的學生才回到我校，共遊行十七個小時。我當天有私事未能參加，從周圍的人聽來這些情況。



在學生的強大衝擊下，政府不得不作出了讓步。２９日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北京市委秘書長袁立本、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召集各校學生幹部舉行“對話”，並由 北京電視臺進行了轉播。雖然他們是突然襲擊，並且學生代表也並非全體學生選舉所產生，三位政府代表也並非如學生要求的級別那樣高，但這畢竟表明政府間接承認了這次學生運動。在對話會上，三位元政府代表巧舌如簧，或強詞奪理，或回避搪塞，或居高臨下教訓學生，激起了廣大學生的不滿。

五月一日，學生放假，但“市高聯”仍未休息。這時各校學生選舉的代表已經產生，遂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遞交了要求實質性對話的“十二條”，並要求政治局在五月三日中午十二點以前答復，否則將再次舉行遊行示威。



政府果然採取了不理睬的態度。五月四日，北京高校學生再次上街遊行。由於上次遊行後好多人還未恢復，許多人便先騎車到長安街，再加入步行隊伍。我騎車到 復興門，在立交橋上等待遊行隊伍。最先過來的是政法大學、北科大的隊伍，他們在九點多通過復興門橋。第二批是以師大、民院為主體的隊伍，夾著外地學生請願 代表，在十二點多通過。最後一批是人大、清華和北大的隊伍，一點多才到。圍觀的市民說，這次學生人數並不比２７號的少，只是不如上次集中。

在復興門加入我校的隊伍後，遇到Ｓ和他的女友，一路行進順利，三點多進入天安門廣場。只見廣場上學生陣容嚴整，旌旗招展，加上圍觀群眾可能有幾十萬人，因為紀念碑以北站滿了密集的人群。

遊行隊伍在廣場集合後，各校代表發表了“五四宣言”，要求政府承認這次學生運動並與學生進行實質性對話，然後各校同學遊行返校。有人帶頭背誦鄧小平“語 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一個革命的政黨，不怕聽到群眾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鄧小平文選》!”“多少頁？”“１３４頁!”他念一 句，大家跟一句，引得圍觀群眾一致喝彩。還有口號：反對腐敗的：“官倒官倒，不打不倒！團結起來，一打就倒！若是不倒，再踹兩腳!”要求平等對話的：“對 話對話，不是訓話！沒有誠意，全是廢話!”“袁木袁木，愚民有術!”

"東昌東昌，造謠中傷！""立本立本，撒謊為本！"要求新聞自由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臺，顛倒黑白！""新聞聯播，儘是瞎說！""參考消息，全是假的！"夾著"國歌"、"國際歌"，口號聲、 歌聲此起彼伏。圍觀市民的熱情也達到高潮，成把的香煙、成箱的麵包、成盒的冰棍源源不斷送到我們手裏。我不抽煙，由於天氣炎熱也不想吃，便吃了不少冰棍， 到最後都吃膩了。走到西直門後，我騎上自行車，隨騎車隊伍回校。

五月五日，新聞發表趙紫陽講話：中國近期不會有大的動亂。這等於間接否定了"４．２６社論"把學運定為動亂的結論。於是學生宣佈複課。至此，持續三個星期的學潮以新的"五四"運動而告終。



另據"美國之音"報導，五四那天，還有長春、瀋陽、大連、天津、西安、武漢、南京、長沙、上海等城市也有學生遊行。我在遊行隊伍中所見到或聽到的外地高 校的旗號：吉林大學、瀋陽大學、遼寧大學、大連醫學院、唐山工學院、唐山財經學院、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河北大學、河北工學院、山西財經學院、西北大學、 濟南大學、煙臺大學、鄭州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中山醫科大學、湘潭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海南大學，還有 "廣東南海縣人民"、"首都青年新聞工作者"等社會群眾的橫幅。

“五四”以後的學運進展　△

（此篇斷斷續續寫於廣場帳篷內，後夾在日記本中，時間大約在五月十六到五月三十一日之間。）

“五四”大遊行後，鑒於趙紫陽的講話，“高聯”部分成員為了表示對政府的妥協，主張複課。而我校自治組委會本來就不得力，於是五月五日正式複課，校園內 頓時鴉雀無聲。但北大、師大等校仍堅持罷課，並先後組織了環城自行車遊行。由於多數學校已複課，政府便採取了不理不睬的態度，學生便計畫採取進一步行動。

５月１３日中午，由北大發起，全北京高校的一千多名學生來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隨行數萬人護衛聲援。我於當晚吃完飯後趕到廣場，廣場已是人流如潮。各界人士聚集成數團，發表演講，辯論觀點，議論時事。因身體疲憊，于淩晨一點返回學校。

１４日，從廣場回來的同學呼籲大家捐獻棉衣和被褥給絕食的同學禦寒。晚上許多同學帶著大衣，匆匆奔赴廣場。我也拿出自己的軍大衣，帶了兩件自己禦寒的毛衣，騎車隨人流湧向廣場。

１５日淩晨，已偶爾有救護車來到廣場，將昏倒的學生送去醫院急救。白天，救護車的警笛呼聲已漸趨頻繁。剛開始時這種聲音真是撕心裂肺，到後來就麻木了。 本來我是不贊成絕食的，就象許多市民對我們說的：吃飽了跟他們（政府）幹！幹嘛要自己摧殘自己？但既然絕食博得了廣大人民的同情，政府就應大度一點，或者 至少聰明一點，順應民心，出來與學生對話。這樣漠不關心只能激起人民對它的鄙視和憤恨。當天絕食團第二批報名，我都想去了。但我看到市民對我們的熱情支 持，覺得最多還有兩天政府就會出來對話，現在去未免有點“投機革命”之嫌，終究沒去。閑著沒事也過意不去，便去當糾察，管理我校營地秩序，或保護救護通道 ［注１］——由紀念碑周圍絕食團駐地通往北京急救中心的馬路。晚上睡在露天實在太冷，過了一會兒只好鑽到過街通道裏去睡。

１５、１６號是最緊張的兩天，廣場上人山人海，晚上下班前後更是擠得水泄不通，加上廣場週邊可能有近百萬人。有的市民順便買些食品和飲料來送給學生，有 的回家做好了飯菜，用三輪車送來，有的只是來跟學生交流交流政治觀點，或出出主意。也有激動的或好事的市民數次想衝擊人民大會堂或中南海，都被學生勸阻。 １５日戈巴契夫來訪，雖然學生讓出了大會堂東門外的廣場部分，但政府可能覺得丟面子，還是把歡迎儀式改在機場，會談地點也改在釣魚臺，只在大會堂舉行了宴 會。由於圍觀群眾太多，我們不得不做了大量工作勸說他們離開大會堂周圍。１６日，由於政府仍未有任何表示，廣場上以致整個北京到處充滿了激憤的人群。

１７日，預報氣溫達２４Ｃ，烈日高照。首都知識界、文藝界和各新聞單

位都打著聲援的旗號出來遊行，並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我在廣場東邊的通道當糾察，從 早晨八點直到第二天淩晨三點，吃了兩頓指揮部統一送來的盒飯。下午由於盒飯不夠，我讓旁邊的一個師大女學生吃，她吃了一小半，又交給我。我將一次性筷子調 個頭，狼吞虎嚥吃了下去。

１８日遇到Ｗ來廣場，他做了一個 橫幅。我便和他及他表弟打著橫幅到廣場以外去宣傳，一路上受到了市民的熱烈歡迎。好多人給我們水喝，或邀請我們吃飯。在火車站外面，一個中年漢子突然從後 面往我兜裏塞了十塊錢，我還沒反應過來，他已騎著車匆匆走了。當我們走到火車站廣場上，前面的巨型螢幕上正在播放趙紫陽、李鵬等當天早晨四點去醫院看望學 生的新聞。這時我才知道他們終於出來了，但還是羞羞答答的。我們在那兒向外地旅客宣傳學生的要求和目的。等我們往回走時，一路上聲援學生的大軍從四面八方 向天安門廣場彙集，大街小巷塞滿了大車、小車和人群。人們喊著“聲援大學生！”“李鵬下臺！”“小平下臺！”等口號。下午兩點多我們回到東長安街，突然狂 風暴雨大作，但遊行隊伍仍有秩序地行進著。工人、農民、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由老師帶領）都表現出良好的紀律，一點也沒有慌亂。四點多，雨停了。我們 打著橫幅上了天安門東觀禮台，觀禮臺上也站滿了人。我們在那兒看到遊行隊伍一直持續到晚上八點多還沒停止，總人數可能超過一百萬。

１９日淩晨四點多，趙紫陽、李鵬到廣場絕食團與學生見面。可惜我當時在地下過道裏睡覺，未能察覺，早上起來才聽別人說起。當天氣氛平靜。晚上八點多我開 始在廣場西邊當糾察，過了一會兒好多市民來詢問絕食是否停止，我說沒聽說。他們說電視新聞已播出。我估計是政府怕國際紅十字會的干預，故意在絕食持續到一 星期前宣佈絕食已停止［注２］。２０日零點剛過不久，廣場上的高音喇叭突然打開，傳來李鵬聲嘶力竭的叫囂：調軍隊進北京戒嚴。隨後是楊尚昆對調兵入城的說 明：解放軍決不是來鎮壓學生的。當時聽了一點也不緊張，只覺得這簡直是一場鬧劇，因為廣場上人山人海，全北京市民都在支持我們，軍隊要進城除非把這些人都 殺了。果然過了一會兒，就有工人來告訴我們：五棵松、軍博方向大批軍車已被市民堵住。隨後傳來各個方向軍車被堵的消息。大量市民湧向廣場來“保衛大學 生”，他們說：軍隊不是來鎮壓學生的，難道是來鎮壓咱老百姓的不成？

２０日白天不斷有直升飛機在廣場上空盤旋，但它每盤旋一次，廣場上的人群就對著它歡笑一次，表示對它的輕蔑。下午，氣氛逐漸緊張。除直升飛機盤旋外，又 傳來軍隊可能要在廣場放催淚彈的消息，於是大家紛紛戴上口罩，沒有口罩的也準備了毛巾。Ｗ的姐姐買了幾十條毛巾來分發給我們。開始紀念碑上的學生廣播台提 醒大家把毛巾浸濕，後來又說現在是新式的催淚彈，毛巾和口罩不要打濕。傍晚又傳來軍隊可能在廣場實施空降的消息，於是很多市民在廣場放了風箏和氣球，以干 擾直升飛機。這時傳來趙紫陽下臺的消息，我們開始意識到調軍隊進城的真正意圖不過是一次軍事政變。

２１日淩晨正在地下通道裏熟睡，突然轟的一聲，通道裏所有的人一陣慌亂將我驚醒。上來外面一看，原來早晨五點鐘廣場熄燈，人們以為軍隊要採取行動，以致 恐慌。天亮後形勢漸趨緩和，我決定回校休整一下，並看一下廣場以

外的情況。晚上本想返回廣場，但身體似乎還未恢復。Ｓ又極力勸阻，認為我們到週邊堵軍車也 很有意義。於是我們一行五人騎車前往清河、沙河一線，看是否有軍隊從這裏開來。Ｙ不知從哪里弄到一個小旗子（實際上就是一塊紅布綁在一根小木棍上），綁在 他的車上，算作我們是學生的標誌。在清河附近的一個轉盤，聚集了一大群市民，一群學生在指揮。他們已用隔離墩、水泥電線杆和下水管道壘起了路障。我們繼續 前進到沙河附近，一群村民坐在路旁。我們問他們有沒有軍車經過附近，他們說軍車可能還在昌平，並問："要不要先把路障壘起來？"我們說應該。於是人群一下 子活動了。大家七手八腳把路邊準備埋設的下水管道推到路中央，並用小石塊和土塊塞緊，然後坐在上面抽煙、聊天。第二天淩晨兩點多還不見軍車過來，便回校休 息。臨走時村民對我們說："你們放心回去，軍車來了保證截住！"

２２日傍晚，Ｆ、Ｙ、Ｘ和我又騎車回到廣場。廣場上人數比前天減少，形勢平靜。

２３日，天氣炎熱。下午各界（主要是知識界、新聞界）舉行了大遊行，抗議政府的戒嚴決定。突然暴雨大作，我們鑽到廣場上一個帳篷內避雨，雨停後我們將此 塑膠篷稍加整理，作為我們的據點。晚飯時照例有市民來送食物。一對老年夫婦用三輪拉來一桶粥停在我們帳篷外，老太太邊給我們舀粥邊說："孩子們，多吃點。 看到今天這麼熱，又下暴雨，真讓我們著急壞了。"

２４日持續酷熱。北京學生大部分已離開廣場，外地學生已占廣場大多數，並據傳外地學生來京已受阻撓。

２５日又舉行學生遊行。我和Ｘ、Ｆ及其女友舉著我們的橫幅參加遊行，沿二環路繞了一圈。因天氣炎熱，人數不多。雖有幾處路邊市民向遊行隊伍噴涼水，但很多人走一陣後散到路旁喝飲料，秩序不好。晚上，Ｘ離開回校，我決定再堅持一夜。

２６日晨騎車回校。當天"美國之音"播送了趙紫陽下臺的消息，並傳趙（紫陽）、胡（啟立）、田（紀雲）、秦（基偉）被定為反革命集團。我和Ｓ、Ｗ等議論 了一下，認為在目前的膠著狀態下，學生應立即公開自己的立場，即要麼支持現政府，要麼支持趙紫陽一派；第三條路就是發動工人、農民，但這是一條艱苦而漫長 的路，非職業政治家而不能為之。因為從一開始，大多數學生和高聯成員認為學運應有自己的主張，應保持和平、理性和純潔，不要被政治集團利用；而趙紫陽的兒 子又是官倒的代表。但是，現在以李鵬為代表的保守派藉口戒嚴實施軍事政變，實際上已從反面利用了學生運動。與其被保守派利用，不如被改革派利用，所以學生 應公開支持以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並號召全國人民響應。

２７日坐車返回廣場，廣場學生人數已非常稀少，四周隔離學生與市民的學生糾察已撤除，市民和閒散人員在學生的帳篷間穿行。學生們都疲憊不堪，並且大多來 自全國各地，很難再組織起像樣的活動。我很憂慮，便將我們在學校議論的想法寫成稿件，準備送交廣場總指揮柴玲。主要意思是：１、現在廣場是

全國的一面旗 幟，我們一定要堅持；２、不要再死守“不被人利用”的原則，因為保守派調兵入京，已從反面利用了這次學運；３、應公開支持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央改革派，並通 電全國。在紀念碑東側的廣播站等了一夜，未見柴玲回來，但又不想交給其他人，因為據說柴玲是堅決主張堅守廣場的，而其他很多高聯成員都主張撤離。第二天早 晨只好把稿件交給了高聯秘書處，便不知下落。

２８日，為回應全球華人大遊行，北京學生和一些知識界人士舉行了遊行。因身體疲乏，未參加，但看起來聲勢很大，不亞於五四遊行。當晚傳出王丹向記者發佈 的消息，說準備３０日撤離廣場。許多市民來質問：“為什麼要撤？我們盡一切力量支援你們，你們要什麼我們給什麼，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撤了，什麼結果也沒有， 咱就白乾了？”我也覺得現在廣場是全國的旗幟；我們一撤，全國的運動就會停止，人民就會失望。

果然，２９日，高聯廣播反復播送聲明，說昨天王丹發佈的消息只不過是他個人的建議，不代表高聯的決定；高聯通過表決，決定至少堅持到６月２０日人大會議 召開。傍晚高聯廣播播出了中央美院等八所藝術院校將在廣場豎立“民主女神”雕像的消息，並招募糾察隊員去維持秩序。我立即去報了名，來到廣場北邊位於南北 中軸線的施工現場［注３］。幾個工人帶領學生在搭腳手架，我們的任務是把圍觀人群和施工場地隔開。據說雕像將在七點鐘豎起，隨後要表演節目。但一直等到晚 上九點，雕像還沒運來，因為找不到車。據說市政府有規定，凡是為學生運動運東西的車輛將被吊銷執照。最後學生終於用三輪車將雕像拉來。這時圍觀人數太多， 秩序混亂。這樣拖了好長時間，我們再三縮小糾察圈，終於在零點左右開始吊裝。由於缺少起重設備，學生們只得爬到腳手架上用帶子將分為四截的雕像吊上去，十 分費事。淩晨三點多，四截都已吊上去並組裝到位，但還要用石膏灌漿銜接。我實在太困，便回帳篷睡覺。

３０日上午九點，雕像揭幕，嚴加其主持民主大學開幕。下午兩點，部分學生為抗議市公安局秘密綁架三名工自聯常委，在市局門口靜坐請願，可能是受到員警的 粗暴干預，高聯廣播呼籲大家立即支援。於是一大群學生扛著大旗向市局門口跑去，將市局圍得水泄不通。市局門口的喇叭反復大聲叫嚷：“現在是戒嚴時期，圍困 公安機關是非法的。”學生派了三名代表進去談判，被抓工人之一錢的妻子和母親也進去了。四點多談判結束，市局答應二十四小時內給答復。我們便撤回廣場，當 晚坐車回校。

３１日，高聯傳出消息，三位元工人代表被釋放。

［注１］救護通道被外界稱為“生命線”，由學生在路兩邊手拉手形成封閉道路，有救護車通過時禁止行人橫穿，沒救護車時在人行橫道放開口子讓行人穿過。當時學生和市民非常自覺，很少隨便穿行。

［注２］後來得知絕食確實停止，我在廣場西南角，未能聽到紀念碑上的高聯廣播。

［注３］當時國旗在廣場東北角，民主女神像大致在現在的旗杆位置。

六月八日

６．３—６．４慘案見聞 △

回校後本想多休息幾天，但１號Ｃ突然來找我，說是來京聯繫工作。２號Ｚ來告訴我Ｍ要找我。下午陪Ｃ去逛了一趟頤和園，又送他到火車站，然後匆匆趕到Ｄ那兒。Ｍ果然在，說是代表Ｊ校學生自治會來京與北京“高聯”聯繫，並送款給該校在京學生。他們已吃完，因時間不早，我帶Ｍ到廣場，找到Ｊ校的營地。他與其他學生見面後，卻不想同他們住在一起，要我帶他回我校。我說：“你這種態度怎麼幹‘革命’？”並告訴他現在已沒車去我校了。他只得和我一起睡到我們的帳篷裏。

半夜突然一陣嘈雜，一打聽，才知道外面有大隊士兵身穿便衣向廣場急行軍，被市民發現並阻擋。一個便衣軍官還來到學生廣播台講話，說軍隊決不是針對學生來的，而是來維護首都秩序的。但事實上，這幾天北京秩序已完全正常了，天安門四周的交通都恢復了，《北京晚報》還報導，在學運期間交通事故和刑事犯罪率明顯低於正常時期，所以根本不需要軍隊來維持秩序。大家將那位軍官轟了下去，有些市民還要揍他，但被學生制止了。

３日早晨醒來很早。聽市民說昨天夜裏東西長安街都有便衣軍人往廣場［跑步而來，他們的武器是單獨裝在另外的車上，有機槍、自動步槍、匕首、鋼絲索等，軍裝也在那些車上，可能是準備對廣場進行突然襲擊，被市民和學生阻擋後他們立即撤回，將這些車輛和武器遺棄。

Ｍ又吃不慣廣場上的食物，一個勁拉我找飯館，幸好周圍的館子都沒開，只好在中山公園旁的小攤買了早點吃。然後陪他去電報大樓給他們學校打電話，報告北京的情況。在途中果然看見馬路上用作路障的公共汽車頂上擺著軍隊遺棄的武器，大批市民在圍觀。六部口那兒有一挺機槍，西單那兒支著三支步槍，幾個學生站在車頂向人群展示鋼絲索，作勒脖子狀。還有一輛掛著武警牌照的車裏裝著子彈箱和制服。我想此事不應如此張揚，學生拿著武器的情景肯定會被政府用來宣傳說學生搶奪解放軍的武器。Ｍ打完電話後要到王府井辦私事，我便陪他往回走。一路上市民都在議論：剛好平靜了幾天，政府又來製造事端。

在王府井就花了一個多小時，回廣場途中Ｍ又要買西瓜給他們的學生吃。我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要吃的好，而是要吃飽；西瓜是奢侈品，還不如買汽水。他說既然“自治會”給了錢，就應該花掉。我說：“你也不能亂花啊。”但他執意買了一個二十多斤的大西瓜。我們一人抱一半到廣場分給了他們學校的學生。他在那兒擺出一副官腔，對下面的學生頤指氣使。我便離開了，說下午兩點半再來找他。

下午兩點半去Ｊ校的營地，學生說Ｍ陪他的親戚去旅館了。遇到Ｑ，市民告訴我們六部口那兒放了催淚彈，並有防暴員警打人，死了一小孩。正說著，有人過來說大會堂西門沖出來一隊士兵。我和Ｑ便往那邊走。

轉到大會堂西側，看到一些人捂著頭被抬了過來，據說是被沖出來的士兵用皮帶打的。西門外場地上約一千士兵排成五、六排人牆圍成一圈，中間一大塊空地。他 們頭戴鋼盔，腰系皮帶，腳穿翻毛皮靴，還有報務員背著步話機（就象《英雄兒女》中王成所背的那種）。外面有更多的市民將他們圍住，有的跟他們講道理：“你 們回去吧，這裏沒什麼事兒。”“你們有種的去打越南人，幹嘛來對付老百姓？”有的嘲弄他們：“喲，穿這麼多，不怕熱嗎？”“你們來戒什麼嚴？你們看看你們 被北京市民戒嚴了。”由於市民與士兵沒有隔離，不時發生摩擦，週邊士兵就用皮帶打人，不時有人捂著頭被抬走。突然西面一位小夥子被揪到圈內，周圍的士兵一 轟而上，用腳踢，皮帶抽。雖然那人早已躺在地上，沒法還手，他們還是打了好一陣，直到他血流滿面，躺在那兒不動彈了才住手。幾分鐘後，來了一輛救護車將他 運走。這些士兵似乎受蒙蔽很深，許多老人和婦女勸他們說：“我們知道你們是被騙來的，但你們看，這裏都是老百姓。你們不要為政府賣命。”他們只是露出不屑 的冷笑。我想可能部隊每天向他們宣傳士兵被打的事（如報上所報導）。

回到廣場，仍未找到Ｍ。吃晚飯後廣場指揮部決定各校人員集中，向紀念碑周圍收縮。Ｙ、Ｆ、Ｘ和Ｑ又來了。我們五人便到中山公園外的草坪上休息。九點左 右，一群人圍著一個士兵從我們面前跑過，有人要打他，有人要保護他。我們立即上去把他圍住，並大喊：“不許打！誰打誰是便衣！”有人說他是防暴員警，我們 說不管他是什麼人都不能打，以免給政府以口實。我們護著他到新華門，交給了門口的武警。但我們五人被沖散，我只好回到原來的地方休息並等他們。四周出奇地 寧靜，我不知不覺睡著了。

十二點左右，突然被一陣隆隆聲驚醒。睜眼一看，一輛裝甲車正從面前馬路上快速駛過。許多人試圖伸手阻攔，但裝甲車毫不理會。裝甲車一過，路邊的市民不約 而同地拆掉路上的隔離欄杆並橫過來作路障。一推自行車的漢子毫不猶豫地放下車子，將路旁的垃圾桶和公共汽車站牌推倒在路上。兩個人將草坪的鐵欄杆也搬到了 馬路上。這些人好象從地下冒出來似的，剛才還寂靜、空曠的馬路一下子喧鬧起來。剛開始還有點緊張，後來看到那麼多人，也就壯起膽來，參加設路障。

路障設好後，很多市民往西去阻截軍隊。我想今天可能就是事件的結局了，戒嚴戒了兩個星期，第一輛軍車終於到了廣場，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信號。我回到廣 場，等待著最後的時刻。廣場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著戒嚴部隊指揮部公告：天安門廣場發生了反革命暴亂，廣大市民和學生要呆家裏，不要上街，否則不能保 證生命安全。我找到一根木棍以備軍隊向廣場衝擊時防身，然而有週邊進來的學生告訴我，十點多時軍隊已在木樨地開槍，當時師大一女生在作為路障的公共汽車上 手拿話筒向士兵喊話，被一梭子彈打來，當場死亡，同時還有三人受傷。有的市民還說可能是橡皮子彈，因為橡皮子彈在近處也能打死人。

我在廣場四周轉了一圈，來到紀念碑南側坐下。這時學生收縮在紀念碑四周，可能已不足萬人。兩點多，有人來說裝甲車已開到紀念碑底下。我連忙轉到北側去看，紀念碑底下並沒有裝甲車，但天安門東側馬路上有一輛裝甲車在燃燒。我走近廣場北邊，才看到天安門前金水橋和馬路上已排滿了士兵，靜靜地注視著廣場，鋼盔閃著幽幽的寒光。邊上一市民說軍隊剛進入天安門前時，廣場西北角一群人向他們扔石塊，一梭子彈打過來，當場死三人。現在這邊不時還有人向他們扔石頭和玻璃瓶，對面還以冷槍。有人腿或腳受傷，幾個北醫學生穿著白大褂在救護。突然一輛首汽的計程車從西北角駛進廣場，差點撞著我。一男子趴在車前蓋上，上身赤膊，背心一個彈洞往外冒血。原來司機想找廣場指揮部搶救傷者。在旗竿附近，一市民告訴我：從永定門到大柵欄，軍隊沿途用機槍或衝鋒槍掃射，用刺刀開路，一賣西瓜的老頭被挑死。那人說彈孔有拳頭大，我猜想是用了開花彈。我們說話當中，西北角又有一穿白大褂的被打中倒地，可能腿部中彈，他又馬上站起來，一瘸一拐地向紀念碑走去。

我想他們既已開殺戒，就不再惜殺人了，原以為軍隊不過把我們強行拖走，還可以用木棍抵抗一下，但現在抵抗不啻找死，於是把木棍扔了。又覺得呆在週邊不安全，便沿著廣場東邊往紀念碑方向走去。這時一隊士兵從前門方向靜悄悄向歷史博物館門口走過來，烏亮的鋼盔寒光閃閃。一大群學生和市民向他們投擲石頭、玻璃瓶，發出叮叮噹當的響聲。我大喊：“別扔！別扔！他們是真槍實彈，你們扔這些有什麼用？”幸虧士兵並未還擊，一直朝北走，將廣場東面完全封死。我回到紀念碑南側臺階上，發現廣場西邊大會堂門口也站滿了密密麻麻的士兵，可能就是白天從大會堂後門沖出去的那一群。

四點半左右，廣場上所有燈光突然全滅了，這是軍隊要強行清場的信號，週邊的市民和學生哄地一下跑開了。圍坐在紀念碑四周的學生緊緊挨在一起，沒有喧嘩，沒有走動，一遍又一遍唱著“國際歌”和“國歌”，等待著壯烈的時刻。我想起了歷史書上“巴黎公社”起義的最後情景：公社社員彈盡糧絕，鎮定地坐在巴士底獄的高牆下，高呼“公社萬歲”，被王軍士兵全部射殺。此情此景，何其相似！一會兒一個外國記者來到我們面前攝影，三個工人開來一輛公共汽車停在我們面前，打開大燈給記者照明。但沒人說話，大家都打著Ｖ字手勢繼續唱歌。

五點左右，紀念碑上學生的喇叭突然傳來侯德健的聲音，大意是說他們四人（另三人是劉曉波、周舵和高新，他們從２號下午四點開始絕食）未和同學們商量，私自去會晤了在廣場的戒嚴部隊某團政委（姓紀或季），提出讓學生和平撤出廣場。該政委與上級聯繫後同意在廣場東南角開一個口子讓學生撤離，並告訴他們，上級已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要在早晨七點之前清場完畢。他話還沒講完，場上許多學生表示反對，說絕不逃跑。接著劉曉波又講話，大意是我們要保存實力，以後的運動就會多一份力量。但反對聲依然很大。最後由廣場指揮部［注１］要大家以喊聲表決，哪個聲音大就按哪個意見辦。先數“一、二、三”，同意撤的喊“撤”；再數“一、二、三”，不同意撤的喊“堅持”。我覺得再在這兒白白送死，實在毫無意義，他們已經殺了那麼多人，再殺幾千人又有什麼區別呢？於是我喊了“撤”。最後指揮部說喊“撤”的聲音大，少數服從多數，要求大家撤。其實我聽起來兩個聲音差不多大，可能指揮部也不願大家作無謂的犧牲。

就在我們表決的過程中，一 隊士兵突然由西面沖到紀念碑南面，將紀念碑到“毛主席紀念堂”之間隔開。他們到位後迅速趴下，就在我們坐的前面十幾米處架起機槍，虎視耽耽地盯著這邊。人 群正在喊“堅持”時，歷史博物館方向的士兵竟喪心病狂地向紀念碑開槍，將一喇叭打壞。南側士兵也抬起槍對紀念碑點射以示威脅。子彈嗖嗖從頭上飛過，紀念碑 上的喇叭全打壞了。這時廣場的燈又亮了。

看來不撤是不行了。各學校排好隊向廣場東南角走去。政法大學還是象平時遊行那樣組成了手拉手的糾察隊，我校跟在他們後面，隊伍比較散。我又朝我們在那兒 度過了“崢嶸歲月”的帳篷望了一眼，我們的橫幅還掛在門口。我趕緊跑過去扯了下來，披在身上，遠遠看到廣場北端一排坦克正沖進廣場。我連忙趕回隊伍。一出 封鎖線，路邊站滿了夾隊送別的市民，有的流著眼淚。他們和我們每個人一一握手，說：“你們一定要回來呀！”我說：“少則三年，多則五載，我們肯定會回來 的。”一中年漢子握著我的手說：“作為一個退伍軍人，我感到恥辱！”

走到前門，天已大亮。一隊士兵（也可能是防暴員警）頭戴防毒面具，手拿盾牌和電棍，和我們擦身而過。市民遠遠地向他們扔石頭，並大罵：“法西斯！”“畜 生！”我們又開始喊口號：“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李鵬畜生！”“絞死李鵬！”“罷工罷市！”……在前門西大街人行道上，市民們指著一灘血跡對我 們說，那是一個七歲的小女孩的血，她被一個軍官用手槍打死。好多同學上去用手巾或衣服擦拭這血跡。我們和市民握手時都說：“北京市民為我們作出的犧牲太大 了！”他們說：“你們要保重，重整旗鼓！”

從前門大街繞到新華街出六部口，長安街上一片劫後景象，到處是磚頭、碎瓶子和破自行車。馬路上散落著燒成炭黑的軍車、坦克和裝甲車，有的還在冒煙。快到 西單時，突然後面有人大喊：“快讓開，坦克來了！”我們本來走在自行車道上，立即往人行道上躲避。坦克發著隆隆的怪叫向我們身邊駛來。一些膽大的市民和學 生向它投擲石塊，但這就象堂吉訶德同風車決鬥一樣徒勞。它向人群發出一枚毒氣彈，繼續往前開。一股黃色煙霧冒了出來。我們立即戴上口罩，擠到路旁一個小胡 同裏。因胡同很小，我們人多，還有人推著自行車，把胡同塞滿了，有人劇烈咳嗽。盡頭一個鐵柵欄門將胡同堵死，裏面好象是一個派出所，一隊員警擋著柵欄門不 讓我們進去。胡同兩邊樓上的市民開著窗戶罵他們：“你們還有沒有人性？”他們不理。坦克開到前面又折回來過了胡同口後，我們才回到大街上，但此時已不成隊 伍了。碰巧遇到昨晚走散的Ｑ，我們倆一起從西單向北走。他告訴我，就是剛才那輛坦克在六部口壓死了好幾個人，那幾個人就走在他後面，在新華街到長安街的拐 角處，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有隔離欄杆，他們走在自行車道上，坦克也開到自行車道上，他們無處躲避，被坦克碾著［注２］。

在新街口大街，數千市民圍著我們詢問廣場裏面的情況，我們簡單跟他們說，廣場裏面沒有外面死的人多。許多人淚流滿面向我們告別，我們說：“我們還會回來的！”有的人要用自行車帶我們回校，但我覺得應該跟著大多數同學步行。

十點多，終於回到學校。同學們已把我作為失蹤人員報到自治會了，見我回來，大家都來看我，有人去自治會把我的名字撤下來。我已經麻木了，一點也不覺疲勞，只是一個勁罵：“他媽的！”

６月５日，我校已有四名學生被確證死亡。我深深覺得，就是因為他們的死，我們才僥倖活下來，因為他們的死讓廣場上的學生看清了政府的兇殘本質，我們才主 動撤離，否則，象我當初想的那樣反抗清場，可能不會活著回來了。下午幫自治會佈置追悼會場，學校許多老師、工人和學生來參加，向四名同學的遺像鞠躬、默 哀。晚上傳來消息，說天安門屠殺者主要是２７軍，醫生從他們傷員的血液中發現了興奮劑，他們說當官的告訴他們廣場有瘟疫，給他們注射了疫苗。

６月６日在不安中度過。不斷有傳聞說軍隊要進駐學校；又有人說軍隊在火車站檢查旅客行李和搜身，凡查出有關學運的傳單、標語、照片等立即逮捕；還有人說３８軍因不滿２７軍屠殺人民而與之火拼。各種傳聞令人人心惶惶。

６月７日下午，我和Ｌ決定出去偵察一下。沿學院路往城內騎，這裏燒了一長串軍車，4 號沒見到，肯定是後來燒的。在西單，仍有不少市民聚在一起議論軍隊殺 人的事。西單路口不遠處的長安街上，一個燒焦的屍體靠在中間的隔離欄杆上，面對著這邊。這就是政府宣傳的被“暴徒”燒死的軍人。市民告訴我們，該士兵在四 號晚上因開槍打死人，被憤怒的市民打死。第二天屍體又被人燒，直到現在也沒人收屍。我覺得噁心，這個政府為了宣傳，愚弄人民，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三號晚上 死了那麼多老百姓，第二天早晨屍體都不見了；而為了宣傳“暴徒”的殘忍，卻讓自己的士兵暴屍街頭達三天之久。

另一小夥子給我們講他的經歷：他昨晚在這兒的商店值夜班，一隊士兵巡邏過來，他躲在一棵樹後觀看，被士兵發現，喝令：“什麼人？出來！”他稍猶豫，對方 一梭子子彈打過來，他大恐，連喊：“別開槍，我是值班的！”士兵過來檢查了他的證件，把他放了，但警告他：“以後注意！”士兵走後他突然覺得陰囊有點痛， 用手一摸，濕乎乎的，還多了一個“蛋”。原來剛才一顆子彈從牆上反彈進他的陰囊，幸虧傷不重。說著，他看看附近沒女性，就解開褲子給我們看他陰囊上的傷 口，又指著商店門口的一棵白楊讓我們看，樹幹上離地一米左右十幾個彈孔清晰可見。他還說 3 號晚上他也在這兒值班，當時這兒死了好幾十人。

突然從西面傳來一陣急促的槍聲。我們沿著一條與長安街平行的小胡同騎到復興門，只見幾十輛軍車和坦克橫在橋上，槍、炮口指向橋兩邊，橋上一隊士兵在站 崗。市民告訴我們，今天早上這兒有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被打死，因為不時有些市民邊罵邊接近這些士兵，等近到一定程度，士兵便開槍威脅，於是市民馬上往回 跑；但過一會兒，這些人又返回來繼續罵，這小女孩從附近經過，正逢開槍，被打中。另一人說，這些當兵的就象土匪，老百姓在遠處罵他們，他們竟對著老百姓撒 尿。

槍聲還在斷斷續續傳來。我們繼續向西來到木樨地，槍聲就是從這兒傳出。

我們躲在河邊的一棵樹後觀察。原來木樨地橋西南一剛竣工的白色大樓內有人零星地向 下面的軍隊射擊，上面每打一槍，下面的士兵便一排排子彈打上去。過了一會兒，一輛坦克開到樓下，對著高層的一個窗戶開了一炮。後來槍聲便沉寂下去了。木樨 地橋上及附近燒毀了上百輛軍車和裝甲車，軍隊用坦克將這些廢車推到路旁，但軍隊一過，市民又將這些廢車推上橋，如此反復數次，直到天黑。

通過這次偵察，我們覺得軍隊暫時不會進駐學校，因為他們要維持從西郊到廣場的補給尚且困難，不可能分散兵力；另外現在高校學生絕大部分已離校，他們沒有必要進校。

［注１］沒記下當時主持表決的人，印象中好象是吾爾開希或封從德，也可能是“四君子”中的一個。

［注２］六月四日中午或五日早晨，有人在中央食堂門口賣一張照片，就是坦克碾人的現場，等我去時已賣完，我班Ｌ買得一張。拍攝者由西向東對著現場拍攝， 背景中新華門前的國旗和初升的太陽十分顯眼，地上四、五個人的屍體和一輛變形的自行車清晰可辨。相信當時至少賣出了幾十張，總有一天會重見天日。

１９９９年６月４日

零散的回憶 △



“六四”以後，中國形成了“八老”問政的局面。這“八老”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楊尚昆、王震、薄一波、宋任窮，另一人好象是鄧穎超或彭真。他們及 其親信、子弟飛揚跋扈，令人想起漢末“十常侍”幹政。鄧小平一句話：“鮑彤就是壞人嘛！”就讓鮑彤坐了七年牢；李先念推出自己的親信江澤民出任總書記；鄧 穎超多次為李鵬撐腰：“李鵬最象（周）總理。”王震因搖滾歌星崔健用搖滾形式演唱“南泥灣”而覺得受了侮辱，下令：崔健不准登臺演出，不准在電視上露面； 楊尚昆因中央電視臺播音員杜憲、薛飛在六四晚上播新聞時穿了喪服而下令“三不准”：不准二人在電視上出聲音、出圖像、出名字，使中國失去了最優秀的播音 員。杜憲至今只能用化名在中央台做編輯，薛飛則流落異國。事實上，後來得知，調軍隊戒嚴也是“八老”在幕後一手操縱。

１９８９年秋開學後，學校開始“清查”，作者被列為重點清查對象，但北京象我這樣的人很多，談了幾次話後寫了一篇認識深刻的“反思”，便蒙混過關。

但在 外地則不然。作者家鄉附近的一個地方院校，要抓“高自聯”頭頭，但該校本無“高自聯”，便將當時帶頭遊行、帶頭喊口號的學生抓起來判了刑。另一位本已畢 業，只因“六四”後要送花圈去北京，在火車站被老師攔回，於是被取消分配資格，回鄉當了農民。

簡評 △

對於“六四”的評價和責任，近來不少胸懷高深學問的人士，經過處心積慮的“理性思考”，紛紛“豁然開朗”：六四的責任在學生，因為他們在軍隊面前未見好 就收；或在趙紫陽，因為他未能勇敢地與學生和市民站在一起阻擋坦克。而調軍隊、下令鎮壓的老人幫及李鵬，則不但沒有責任，反而快成了民族英雄。筆者不禁惴 惴，翻開塵封十年的日記，搜尋記憶中的各種線索，冒昧地拋出卑微的淺見。

學生的失誤（注意，是失誤）：一開始絕大多數學生（不止是學生領導）竭力維護學運的純潔，自以為在代表人民說話，避免被高層政治鬥爭利用。這樣不僅從一 開始就站在高層保守勢力的對面，也站在高層進步勢力的對面。殊不知學生運動本身就是政治運動，總要被人利用，只要利益一致，就應互相利用。如果學生積極與 高層進步勢力溝通，並在適當時候（比如趙紫陽五四講話後）公開支持他們，則他們就可能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挺身而出，與學生和市民站在一起。有人指責趙紫陽未 能象葉利欽那樣在關鍵時刻站出來，但他本人也曾是學生攻擊的對象，如果他站出來，學生會支持他嗎？會不會落得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學生領袖的錯誤：他們在反獨裁，爭民主的同時，自己卻在不自覺地反民主。他們從中共那裏學來了神秘政治、黑箱作業，大部分時間忙於爭權奪利，卻不去做艱 苦細緻的工作－－－－－建立嚴密的組織，舉行公開的政策辯論和選舉。筆者絕不認為他們的人格有問題，而相信絕大多數人如果處在他們當時的地位，也會做出同樣 的事。這是這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局限。

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高層進步勢力的失誤：雖然多次間接肯定學運，但一直沒有公開表態支持學生，沒有明確表示高層存在兩派的鬥爭。如果他們當時明確表示有兩 派，一派支持學生，一派要鎮壓，學生就會在攤牌的時刻支持他們。特別在５月２０日之前，趙的勢力在政治局還占多數，還控制著北京軍區和部分輿論工具，如果 他通過新聞媒介表明支援學生和市民，並與保守派攤牌，則學生和市民就會站在他一邊，軍隊也就不能進北京。可惜他自囿於“黨的紀律”，坐失良機，被對手先下 手為強。

以老人幫和李鵬為代表的保守勢力：他們信奉“老子打了天下就該坐天下”的格言，以為“朕即天下”，為了一己、一黨（實際上是黨內一小撮）之私利，不惜以 “二十萬人的生命”換取權位的苟延殘喘。他們自始至終把自己放在學生和市民的對立面，拿著武器步步進逼，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他們沒有“天下

為公”的概 念，視人命如草芥，是地地道道的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是“六四”慘案的罪魁禍首，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六四”要不要平反？ △

我的答案是：不要，因為無“反”可平。“六四”誰正誰反？大多數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心裏是清楚的：當時的政府是兇手，學生和市民（包括外地群眾）是受害者。事實都已清楚，只等歷史的審判。難道我們還要懇求兇手給受害人“平反”嗎？

一小撮善於“理性思考”的幫閒文人妄圖混淆視聽，把責任推到學生或學生領袖身上，實在是別有用心。他們實際是說：你們本應跪著，但你們卻站了起來，所以 該死。另一些人說：“六四”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際地位提高，所以當初鎮壓是對的。這種說法，二十年前鄧小平在否定“文革”時就反駁過。當時一道時事 政治題：“文革”中我國經濟大幅度發展，人造衛星上天，為什麼還要徹底否定“文革”？中央文件上有答案：如果沒有“文革”，經濟發展會更快，人民生活水平 會更高。現在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六四鎮壓，中國經濟發展會更快，更健康，政治更開放，國際地位會更高。只要看看“六四”後國內貪污腐敗橫行，貧富分化 加大，人人只顧自己，道德淪喪，國際形象與一些獨裁小國並列，就可明白上述反駁絕非強詞奪理。

再來看看普通老百姓的看法。北京市民就不用說了。筆者老家在一偏遠鄉村，８９年時這裏沒有短波收音機聽“美國之音”，多數家庭有黑白電視機，剩下的有收 音機，鄉民沒有什麼高深的文化，聽到、看到的完全是政府的宣傳，但就從政府的宣傳他們知道兩件事：一、學生遊行針對政府，二、政府調軍隊鎮壓。六四那天， 我們村長對我媽說：“鄧小平現在是失去人性了。”我回家後，一退伍軍人對我說：“政府故意扔一些舊坦克讓你們燒了，好把你們抓起來。”我說軍隊先開槍，他 說：“是呀，但只要你們一燒，就有口說不清了。”鄰居老大爺對我說：“嚇壞了吧。當年鎮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鬥地主，多厲害的人都被共 產黨整下去了，你們哪鬥得過他們？”可見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本性很清楚，在他們心裏，共產黨治國從來不是以德服人，而是以暴力和欺騙壓人。

（完）

□　摘自《華夏論壇》